

建筑批评事件中偏离建筑的非理性话语及其理性应对

严宇涵

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 201804

DOI:10.61369/ME.2025080022

摘要：2023年11月6日，一则佳木斯体育馆发生坍塌的视频在网络中传播，公众就此展开广泛的讨论；7日救援完成，确认3人遇难。在此次建筑实践批评事件中，大部分公众通过非理性话语自主发起社会动员，其情绪主要表现为偏离建筑本身的非理性话语，在部分专家、意见领袖等介入后，逐渐出现部分针对建筑本身进行的理性分析，而整体来看非理性话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通过爬取“佳木斯体育馆坍塌”事件相关热门微博的评论，探析公众在此次事件中的整体情绪，从而分析这种偏离建筑本身的非理性话语的成因。分析发现这种理性话语一方面是由于网民的“有限理性”本能，另一方面又是由于网络中自媒体群体动员下公众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同时意见领袖社会责任欠缺也是造成非理性的原因之一。这样的非理性话语给政府、公众和第三方建筑承包商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各种现实伤害，加大了对不合理因素的消极成见，固化了人们对非理性因素的负面刻板印象，基于此，本文从非理性因素本身、权威机构、意见领袖三个角度提出了理性应对的策略，有利于政府保持理性重建的战略定力，以正确的决策有效避免悲剧重演，保障公众安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

关键词：建筑批评；非理性话语；网络舆论

Irrational Discourse Deviating from Architecture in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Incidents and Their Rational Responses

Yan Yuhan

College of Art and Media,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Abstract : On November 6, 2023, a video of the collapse of the Jiamusi Gymnasium spread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began extensive discussions about it. The rescue operation was completed on the 7th, and three people were confirmed dead. In this incident of criticism of architectural practice, the majority of the public initiated social mobilization through irrational discourse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Their emotions were mainly manifested as irrational words that deviated from the architecture itself.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some experts, opinion leaders, etc., some rational analyses targeting the architecture itself gradually emerged. Overall, irrational discourse still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verall public sentiment in the "Jiamusi Gymnasium Collapse" incident by crawling the comments on the popular Weibo posts related to it, and thereb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such irrational discourse that deviates from the building itself.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rational discourse is, on the one hand, due to the "limited rationality" instinct of netize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the public has developed a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under the mobilization of self-media groups on the Internet. Meanwhile, the lack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mong opinion leaders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irrationality. Such irrational remarks have brought various practical harms to the government, the public and third-party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in social management, intensified negative stereotypes about unreasonable factors, and solidified people's negative stereotypes about irrational factor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rational coping strategi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rrational factors themselves, authoritative institutions and opinion leaders. It is conducive to the government maintaining a strategic resolve for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making correct decisions to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tragedies, ensuring public safety, and continuously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Keywords :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irrational words; online public opinion

非理性因素存在于人们的主观世界中，是信念、情感、意志、欲望等主体意识形态与顿悟、冲动、直觉、幻想、灵感等主体心理结构的综合表现。在重大社会事件中常常出现非理性话语，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在非理性情绪的裹挟下，言语的产生与传播会在“群敌”

下的价值错位、道德绑架中的偏见中加强，形成情绪化下的话语霸权，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在这种“非理性”的语境中，常出现谣言的宣泄、情绪语境中事实的消解、权力的失范……在建筑批评事件中，非理性话语表现为公众偏离针对建筑本身的理性讨论，而转向对政府及建筑承包商的不满、问责、抱怨等非理性消极行为，在这些行为中建筑本身似乎“隐形”了，在公众的话语中看不到围绕建筑坍塌原因而展开的就建筑质量、构造等的讨论，这样的非理性话语给政府、公众和第三方建筑承包商带来种种实际危害，给社会治理增加了挑战难度，固化了人们对非理性因素的负面刻板印象。

2023年11月6日，一则佳木斯体育馆发生坍塌的视频在网络中传播，公众就此展开广泛的讨论；7日救援完成，确认3人遇难。在此次重大社会事件中，大部分公众通过非理性话语自主发起社会动员，其情绪主要表现为偏离建筑本身的非理性话语。因此，本文将围绕本次建筑批评事件中的非理性话语展开研究，探究建筑批评事件中的非理性话语成因有利于政府保持理性重建的战略定力，以正确的决策有效避免悲剧重演，保障公众安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

一、共同情感与非理性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这一理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多伊奇将其定义为“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同时也指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1]，他将社会动员作为一种社会化经验的一种心理和行动历程；也有一些学者从“集体行动”和“现代治理方法”视角出发，将社会动员定义为“促使个体组织起来参与到集体行动的一种机制”^[2]，其目的在于说明社会成员能够利用各种渠道和途径，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态度、价值观和预期产生影响，从而在思想上达成某种共识，动员社会成员参与某一社会活动，以达到某种社会目的；基于社会风险道德治理和应急管理的视角，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动员是“国家为成功地预防和应对突发状况而有效地调动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活动”^[3]。

在社会公共事件传播的过程中，公众形成某种共同情感，基于共同情感形成群体，由于群体效应更容易采取共同行动以达成群体目标。自2023年11月6日佳木斯体育馆坍塌视频于新浪微博曝光后，其持续受到广泛的关注度，在众多媒体报道、各意见领袖介入的过程中，公众通过微博评论表达对事件以及后续的解决策略等的看法和情绪，以期通过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本文利用词频分析法把握公众在事件中的整体情感态度以及讨论焦点。

(一) 事件主体的身份赋予：高频词反映公众情感

词汇是文本构建的基础，高频词汇能够反映出事件的性质、公众诉求、情绪以及采取的行动等。本文选取事件发生后新浪微博中有关“佳木斯体育馆坍塌事故”的媒体报道，通过八爪鱼网络爬虫抓取微博评论5781条，清洗后进行分词，并基于此数据进行词频分析。

表1 评论高频词汇前30

4	希望	动词	153
5	逝者	名词	141
6	安息	动词	186
7	坍塌	动词	111
8	怎么	动词	90
9	严查	动词	90
10	事故	名词	88
11	豆腐渣工程	形容词	73
12	孩子	名词	71
13	齐齐哈尔	名词	68
14	发生	动词	65
15	建筑	名词	63
16	问题	名词	61
17	排查	动词	61
18	大雪	名词	59
19	安全	形容词	56
20	检查	动词	55
21	什么	代词	52
22	我们	代词	49
23	俱乐部	名词	47
24	东北	名词	44
25	之前	名词	43
26	质量	名词	42
27	这样	代词	38
28	不能	动词	37
29	压塌	动词	36
30	尽快	副词	34

通过词频分析能够基本把握事物当前的发展情况，并预测其未来趋势，推测不同事物之间的潜在联系，通过对爬取道德微博评论进行总体词频分析侧面显示了公众在佳木斯体育馆坍塌事件中的基本情感倾向。根据对所有数据进行总体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到网民在事故相关微博的评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名词，表

达了公众对事件涉及的不同角色倾注了不同的情感，在话语中主观地把事件双方当事人赋予了作恶的“加害者”和弱势的“被害者”的身份，而在这些名词中提及建筑本身的仅占16.8%，绝大部分评论均为偏离建筑本身的非理性讨论，公众在建筑批评事件中被负面情绪裹挟，缺乏针对建筑本身的理性讨论。

（二）共同情感的形成：非理性因素下的情感表征

1.伤感与惋惜

在“佳木斯体育馆坍塌”事件中，事发时共有7人被困现场，其中3人自行逃脱，1人轻伤，3人不幸遇难，公众由于对无辜遇难的生命感到惋惜，同时产生对生命的无助的伤感之情，进而产生对“豆腐渣工程”的谴责，于是更容易团结起采取集体行动。11月6日事发当晚，“佳木斯一体育馆发生坍塌”登上热搜，11月7日“佳木斯坍塌体育馆3人遇难”瞬间引爆话题，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公众自发在评论区发布“平安”“希望”“逝者安息”等话语表达对遇难者的伤感与惋惜。11月8日，其中一名遇难者母亲发布“我给儿子规划了未来，但没规划葬礼”的言论再次引发公众的广泛讨论，人们心中的“同情”之共同情感被极大程度地唤起，引起人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怜悯，进而引发公众对建筑坍塌的不满与疑虑，以及和相关负责人与政府的愤怒与呼吁。

2.不满与疑虑

佳木斯体育馆位于黑龙江省，黑龙江省于2023年7月曾经发生过一次体育馆坍塌事故，在此基础上今年11月再次发生佳木斯坍塌，“黑龙江百余天内连发两起体育馆坍塌事故”的词条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网友因此对政府、建筑承包商表现出极度的不满与疑惑，对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表现出极强的求治欲望，“豆腐渣工程”“以前”“怎么”“什么”等词汇频现。

一方面，在事故突发阶段网友通过微博频频发问，“怎么又坍塌了？”“之前不是塌过一次吗？”，有网友将矛头指向建筑承包商，质问其是否为“豆腐渣工程”；另一方面，部分网友将事故主要责任方归于黑龙江政府，质疑其是否尽其应尽责任定期进行安全排查，指责政府官员监管不力，不能防范于未然，腾讯新闻称“黑龙江坍塌的不止两座体育馆，还有东北人民的安全感”。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建筑承包商，此次重大突发事件中公众普遍表现出不满的负面情感，且对日后的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表现出疑虑。

3.质疑与解释

在经过调查后，工作人员称此次坍塌是降雪造成的，不少网友留言称，东北大雪常见，是否真的与大雪有关？建筑应当设计应当以当地环境为基础，因降雪坍塌的建筑批评事件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如何避免悲剧再次上演？事件发生后，不少专家就此次媒介批评事件发表专业看法，针对建筑本身进行理性分析，微博博主“睡前视频基地”以“还原‘11·6’桦南县悦城体育俱乐部坍塌事故过程，分析事故原因”为题制作视频，解释事故发生缘由。

二、偏离建筑的非理性话语成因分析

在本次佳木斯体育馆坍塌事件中，尽管有部分专家、意见领袖等理性分析建筑坍塌的原因，但从词频来看，绝大部分公众是在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裹挟下发表偏离建筑本身的言论，这种非理性话语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网民的“有限理性”本能

在建筑批评事件中，网络舆论伴随着非理性因素逐渐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网民的一种“非理性本能”。互联网时代，技术赋权下人们拥有了更多话语权，因此在网络空间里，主流媒体等权威声音的影响被消解，网络环境中的规则也被淡化，在匿名性的特征下人们拥有更多的的话语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网民的发言内容和方式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来演说与自己人生经历相关的内容以抒发自身情绪。社会决定社会意识，“观念的东西不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

网络上的某些言论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却蕴含着说话者的情感、政治倾向、现实需求和个人愿望；另一方面，当非理性因素介入到网络言论并演变为网络舆论时，同样需要借助各种具体的言语形态如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表达方式相助。在佳木斯体育馆发生坍塌后，网民出于本能的善良与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表现出伤感与惋惜的共同情感，进而将这种非理性的转换成在网络中发表对政府有关部门和建筑承包商等的不满的言论，梅塞尔斯认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而不满、怨恨等是导致集体行为的直接原因。^[5]因此，互联网上的个体由于其“有限理性”的本能，使得网络舆论与非理性因素之间的紧密结合成为可能，从而诱发在非理性情绪裹挟下的集体行动。

（二）自媒体群体动员下的相对剥夺感

当前，自媒体传播的极端化、碎片化、下沉化使得网络舆论传播环境中的“优胜劣汰”效应明显，自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与传播力。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赋予了每个个体、群体以完全的话语权，且自媒体固有“亲民性”从而能产生人际传播和集体传播的效应。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同时指出人们一旦形成群体，就会表现出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绪激动等特点。^[6]在佳木斯体育馆坍塌事件发生后，微博相关话题立即登上热搜，有关事件的言论满天飞，公众在舆论狂欢下造成群体极化的现象，以较为激动的言语集体指责因政府监管不力，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低导致建筑发生坍塌，建筑不仅仅是物质的体现，更是公民生活安全的保障，黑龙江在短短三个月内发生两起建筑坍塌事件，当地公民认为自身应享有的安全保障被“剥夺”了，从而产生对自身安全无法得到社会保障的忧虑，格尔提出的“相对剥夺感”理论认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如果个体社会价值期望无法从社会价值能力中得到实现就

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越大，个体的反抗意念就越强烈，对社会的破坏力就越大，这一过程被称为挫折—反抗机制。^[7]因公共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导致公众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这种剥夺感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产生消极情绪，促使公众以激烈的言论追责政府，而后政府的一系列排查行为也被公众以对抗的情绪认为是于事无补，央视网称佳木斯体育馆坍塌后政府进行的建筑排查是“用生命换来的回头看”。

(三) 意见领袖社会责任欠缺

在传统媒介时代，大众媒介在创造“意见气候”，即舆论的形成和引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8]。在新媒体时代，以传统媒体为主的传播环境向以互联网为主体的传媒环境转变，已经由“正本清源”过渡到“守正创新”的关键时期^[9]。所谓的正面宣传，本质上就是要发挥传媒等传播主体的积极建构性，其终极目标在于推动整个社会资讯体系的健康运转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在新媒体情境中，“人人都有麦克风”，这样的主动建构不仅仅是像传统媒体这样的权威性的社交传播机构应该承担的，更是每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网络舆论领袖所应承担的。这种积极的建构性首先体现在正面情感的建构上，网络上的意见领袖们利用自身的言行，可以对社会中的舆情进行引导，正面的情感常常可以激励人心，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在佳木斯体育馆坍塌事件中，舆论领袖这一正面情感的建构能力还不够强，这可能会造成公众对公共事件缺乏客观性的认知，公众在事件中情绪倾诉表达多于针对建筑本身的理性讨论，进而产生了对建筑安全性存疑的社会恐慌，增加了社会稳定的风险。就此而言，需要意见领袖进一步增加具有积极建构性的意见表达，增强社会责任。

三、非理性话语的理性应对策略

(一) 利用非理性因素促成正向网络舆情

非理性因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也能发挥积极作用，巧妙利用公众的非理性话语也能促成正向网络舆情，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目前已有研究表明，个体观看行为是人类网络群体行为的宏观进化基础，而作为一种宏观体系层次的涌现，其群体行为的形成离不开以网民为主体的微观行为^[10]。在建筑批评事件中，非理性行为作为人的一种本能行为，可以按照从想到行动、从个体到群体的路径来使其发挥理性作用。

首先，利用理性信念来激励群体形成共同价值观念。信仰是一种具有特定目的性和方向性的主体心理，它与个人的认知活动融为一体，网络舆论场所带来的是一种感官体验，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一种置身于其中的感觉，传统的理论灌输和正面的说教可能会受到莫名的排斥。但是，在真实事件构造的虚拟情景之中，任何的平凡之举、伟大壮举都能放大网民的情绪，进而激发群体行动，这是一种非理性状态下的本能冲动。

另一方面，以情为本，培养人们的良好的社会心理。在利用大数据技术向网民推送信息、事件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更多地关心和关心普通人，各大网络平台和客户端要注重对普通人命运的同情，多写写他们的想法，这样才能更有说服力。^[11]总而言之，在细节上巧妙地利用非理性因素，引导形成一个积极的网络舆论，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促进社会的稳定。

(二) 权威机构破除非理性误读

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政府网络话语治理能力面临严峻挑战。面对互联网环境下的非理性情感与话语，政府权威机构必须深入挖掘舆情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动机与动员机理，从事件的本原特征出发，掌握突发事件的发生机理、动员逻辑、规模、社会影响，达到对突发事件的平衡认知；其次，要合理衡量理性与非理性的因素，破除对非理性的妖魔化认识，单纯地将事件归类为“一刀切”，会增加对事件治理导向的难度与难度。在舆情趋势没有被定格以前，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地创造协商的环境和表达的空间，加强对网络言论的人文管理与柔性治理，用正确的价值观与理念进行理性的引导，使对话在正确的概念指导下顺利开展。

(三) 意见领袖建构交往理性

网络空间的重新中心化凸显了舆论领袖在网络会话中的重要作用，巨量信息的冲击使公众面临着认知超载，而“被信赖的信息委托人”则是舆论领袖新的身份识别方式。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公众的非理性话语本质是公众的情感、理念、立场与专业人员的碰撞与对峙，而意见领袖的对话与交流模式对于维系对话秩序、涵化交往理性、避免话语冲突具有重要作用。哈贝马斯提倡以重构交往合理性为途径，建立一种合理的、和谐的交流社会，交际行为是指交际对象借助语言这个中介，在交际中实现相互理解，顺利地进行交流。^[12]交际理性是建立在语言行为之上的，它是在交流过程中互相了解、互相配合的根本机理，它是为了实现交往社区中所有人都能认同的合理目的而进行的^[13]。面对建筑批评事件中的专业理性与普通公众非理性的强烈对抗以及因矛盾而产生的流言与事实湮灭风险，身为意见领袖，更应该提高自己的媒体素养与交往理性，以合理的交往与对话为基础，传播正确的声音，营造出一种在交往中，群体之间互相认同与尊重的环境气氛。

四、结语

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公众参政议政水平的提高，使得突发公共事件中网民的非理性情绪和话语得以不断生产与传播，“佳木斯体育馆坍塌”事故发生后，在微博平台涌现的非理性话语突出了当前社会下公众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态度与社会心理。在该事件中，网民与政府相关、专家、意见领袖是在一个互动过程中，共同赋予了偏离建筑本体的非理性话语与围绕建筑本身的理性讨论以意义，其生产过程表明，在新媒体时代只要主动让渡给

网民部分话语权，就可能使非理性话语成为影响事件舆论走向和社会和谐的一种强大的话语力量。

本文基于在建筑批评事件中偏离建筑本身的非理性话语，从网民、自媒体和意见领袖三个主体上分析其成因，但网络舆情发展下的非理性话语难以预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突发事件能否妥

善处理，公众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怎样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非理性话语，引导网民理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从而使得舆论在更为规范合的框架中推动社会互动的良性发展，需要政府、媒体和网民多个主体共同努力，因此，本文最后一章基于前文分析提出了几点策略建议。

参考文献

- [1] 艾森斯塔德 , S-N . 现代化 : 抗拒与变迁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88:18.
- [2] 李永强 , 李杰 , 刘金菊 . 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 [J]. 社会科学家 , 2020,(07):33–37.DOI:10.19863/j.cnki.issn.1002-3240.2020.07.005.
- [3] 王宏伟 . 从梅里雪山雪崩事件看应急社会动员 [J]. 中国减灾 , 2007(07):24–25.
- [4]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9:22.
- [5] melser , Neil J.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J].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62.
- [6] 法斯塔斯 · 勒庞 . 乌合之众 [M]. 董强 , 译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 2018:6.
- [7] Gurr T 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J]. 1970.
- [8] 张勇锋 . 舆论引导的中国范式与路径：“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新探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11(9): 26–31.
- [9] 刘伯贤 . “正面宣传为主”的理论起源与价值意蕴 [J]. 传媒观察 , 2022(1):83–90.
- [10] 吕鹏 . 人类网络群体行为生命周期模型研究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2021(6):12.
- [11] 赵仁青 , 黄志斌 . 网络舆情与非理性因素粘连的现实镜鉴 [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22, 34(05):83–91.
- [12] 杨凯 , 吴芳 . 论西方对话理论的源起与发展 [J]. 巢湖学院学报 , 2009, 11(2):14–18.
- [13] 龚群 . 道德乌托邦的重构 : 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学思想研究 [M].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2003:28.